

为当下文艺批评开两张“处方”

——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四周年

胡功胜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合肥 230053)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当下文艺批评顽疾进行精准“把脉”的同时,也为消除种种怪象开出了两张内外兼治的“处方”:一是“内治”文艺批评的责任担当与功利意识问题;二是“外治”文艺批评的中西理论资源问题。功利和人情如果过多过深地介入了文艺批评的操作,批评的公信力就很值得怀疑。在理论资源的接受上,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

关键词:《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批评;责任担当;功利意识;中西理论资源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19)02-0116-06

DOI: 10.19747/j.cnki.1009-2463.2019.02.019

Two “Prescriptions” for Current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To Commemorate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 Releas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Literary and Art Work*

HU Gongshe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3, China)

Abstract: In hi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Literary and Art Work,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arried out a precise and accurate examination of the persistent illnes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At the same time, he made two “prescriptions” for eliminating the illness: one is “internal governanc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and utilitarian consciousness of the criticism, and the other “external governance” for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criticism. If utilitarianism and personal partiality get too much and too deeply involved in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the credibility of the criticism will be doubted. As for the acceptance of theoretical resources, western theories cannot be simply applied to Chinese aesthetic.

Key words: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Literary and Art Work*;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responsibility; utilitarian consciousness;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etical resources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生动、形象又相当精准地描述了当前中国文艺的诸多怪象,其中“吹捧奉承: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1],说的就是当下的文艺批评,涉及文艺批评主体内在的人格修养问题,诊断出的是当下文艺批评的“内伤”;其中“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涉及文艺批评主体外在的理论资源问题,诊断出的是当下文艺

批评的“外伤”。在《讲话》中,习总书记在对当下文艺批评顽疾进行精准“把脉”的同时,也为消除种种怪象开出了两张内外兼治的“处方”:一是“内治”文艺批评的责任担当与功利意识问题;二是“外治”文艺批评的中西理论资源问题。

—

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评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贯方针。在《讲话》中,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对文艺批评作了科学

收稿日期:2019-01-02

作者简介:胡功胜(1970—),男,安徽太湖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

的定位:“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1]这是我们党长期领导文艺评论工作的成功经验与当下文艺批评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概括,既符合文艺的审美规律,又是新时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客观要求。

文艺批评是文艺批评者在文艺鉴赏的基础上,对作家、艺术家、作品和文艺现象进行分析、认识和评价的科学阐释活动,它是作家、艺术家与读者之间一个重要的媒介和桥梁,既能对文艺作品起到或支持鼓励或纠偏劝诫的指导作用,又能影响读者的文艺欣赏、文艺接受以及文艺社会功能的发挥,甚至可以改变和形成一个时代的文艺风格,引领一个时代的文艺风尚。文艺批评对文艺家和读者的这种双向作用要求文艺批评秉承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讲究责任担当的人格素养,既要“寻美”,也要“求疵”,目的就是形成一个良好的文艺生态,促进文艺创作和欣赏水平的全面提高。然而,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语境中,文艺批评的寻美之辞在泛滥,求疵的否定意见在枯竭,文艺批评的功利观念在强化,责任担当意识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见不得“利”,二是忘不了“情”。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效益至上的文化语境,近几年来文化产业的强势启动,文艺批评更是作为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被整合进了文化消费“车间”的流水线中去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市场为导向的文艺批评主体,有如产业运作者手中的提线木偶,看似有各种各样的动作,其实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气氛热烈的作品研讨会成了文艺产品的推销会,引领阅读风向的读书报成为出版商统一策划的“卖书报”,严肃的批评写作只能在某种学术体制内为职称谋、为考核谋而对准核心期刊,轻松活泼的媒体批评成了“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的展销平台。对此,清华大学肖鹰教授做了一个细节化的描述:“媒体化批评家们在媒体的统一体制规定下,集体阅读、集体思考、集体发言。媒体化批评家不再发现,而是沿着媒体预定的文化路线跟进;他们不再思考,而是按照某种既定的主旨发言;他们不再判断,而是对规定的判断添加表现‘个人批评风格’的修辞……常常以‘嘉年华式’的聚焦方式,配合着出版商或相关的利益集团,精心制造一个个文

化消费符号,而不是提供种种富有魅力的审美发现。它不再关注批评本身在审美创造上的愉悦,而只关注批评的商业效果和利益收成。”^[2]

于是,我们的文化市场上便出现了众多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天上飞着,地上跑着,匆忙的身影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作品研讨会中赶场子,有的来不及仔细阅读作品便可以唾沫横飞地重复着相似的赞美言辞。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内容、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批评家收到了厚厚的红包,出版商增加了销售码洋,作家自然也是名利双收。只是我们的不少批评家就这样被研讨会绑架,被出版商收买,被新媒体挟持,迈不开手脚,他们能做的也就是无原则、无是非地批量复制着违心的好话。就这样,批评家成了文艺家、商家、媒体的附庸和“应声虫”,成了文化市场媚俗、胡吹、滥捧的“吹鼓手”,批评行为成了装样子、走过场,批评的结果自然是一场场文艺作品的推销会,一个个满街吆喝、招徕顾客的商品广告。“利”字当头,文艺批评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操守和骨气,沦为金钱的奴隶,到处是市侩主义的金钱交易,到处弥漫着物质主义的铜臭。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3],与文艺创作一样,文艺批评也有“情”,是作品阅读后激起的审美情感之“情”,而当下的文艺批评之“情”已不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倡之“情”了。

这“情”是抹不开情面之“情”。现行的创作体制和批评体制在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个圈子,如文联作协之圈、高校研究所之圈、批评报刊之圈、大学教授之圈、同学圈、朋友圈,圈圈相扣,满天飞的作品研讨会更是让不同的圈圈形成了无数的交集。到处都是熟悉的面孔,到处都有交杯换盏的感情,写起批评文章来怎么下得去“刀子”呢?自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次你抬我,下次我抬你,皇帝轮流做,好马轮流骑,互相捧个场,相互点个赞,这样每次见面都能一团和气地握手、打拱、拥抱、干杯。俗话说,“文人相轻”,其实“相轻”并不见得是坏事,因为相轻别人必要拿出自己的过人之处,倒可以营造一种相互激励的竞争氛围,遗憾的是,现在文艺批评中的“相轻”在公开场合很少见了,一般都是有意见保留,最多会后私下分享,场面上只说些给面子的话。理解万岁,既然哄抬式的批评到处都受欢迎,更能带来名利双收,更能迎合投桃报李的人情世故,谁愿为了说真话撕破脸皮呢?

这“情”是仰视权威的敬仰之情。在一个功利意识非常强的文化语境中,许多小有名气的批评家对成长中的年轻作家、艺术家视若无睹,还没有建立感情么,为什么要花费宝贵时间看你的作品、写你的评论文章呢?而知名作家艺术家具有非常高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参加这些作家艺术家的作品研讨会会有面子,写他们的评论文章好发表,但是,人一旦有名气,脾气也跟着大了起来,修养好的作家、艺术家对否定性批评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笑置之;修养不好的作家、艺术家则成了“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一摸就跳起来”。可怜的是我们的批评家虽拥有教授、博士头衔,但名声地位远不及知名作家、艺术家,慑于压力,碍于情面,许多批评家只能选择逃避,学会应付,做些应景式、捧脚式的批评。学术期刊虽有争鸣,但也不想得罪大师名家,大家都在江湖上混,抬头不见低头见,谁都不想与哪个“大侠”结下梁子,虽有一些愣头青站出来写些否定性的批评文章,但没有多少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的平台。为职称计,为考核计,权衡利弊,写些容易发表的批评文章是正经。可怕的是,大话、空话、假话说了三遍就成了真理,认定是真理后说起来更加理直气壮、情绪激昂,说它一万遍也面不改色心不跳,如此恶性循环,如此滥情滔天,怎么不造成“寻美”批评的泛滥?

二

如果说是功利意识与人情面子诱发了当下文艺批评的“内疾”,它关涉的是内在的批评主体的态度问题,那么理论资源的“唯西是从”则是造成当下文艺批评“外伤”的根源,它关涉的是外在的批评主体的能力问题。总书记在《讲话》中对这个“外伤”的诊断是:“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1]说的虽是当下的文艺创作,也揭示了与之呼应的文艺批评。

外来文论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百年文学批评来说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这个过程做一简单的回顾,也许可以梳理一下我们处理中西文化资源中的成败得失。总体来说,在上个世纪中华民族风云变幻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艺批评理论也随之摇摇摆摆,站不稳自己的脚跟,最初是从西方“盗来火种”,接着是虔诚地学习苏联,最后又全方位地拥抱西方,一直都没有形成自主性民族批评话语体系。细细数来,教训非

常深刻。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对文艺问题的反思起源于西方现代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参照,一批首先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的艰难时世,在文化上掀起了启蒙与救亡这两个宏大主题。在这种时代主潮中,文艺批评一马当先,试图用西方现代思想、逻辑范畴来激活中国传统的文论资源,寻求中国文艺批评现代化的突围路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首先一改中国传统批评简单朴素的感悟、评点与考证模式,西方现代哲学美学逻辑的广泛运用使这个文本具有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现代特征,表现出一定体系化的逻辑思辨力量。王国维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发展的终结和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发展的开始”^[4]。“五四”时期,各种西方哲学、美学、文艺思想的涌入掀起了中国现当代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蔡元培后来对这个现象做了这样的总结:“短短十几年间,把自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的欧洲文艺思潮,几乎重演了一遍。”^[5]但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号角中,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理论资源很大程度上是当作一个被批判的靶的而存在,虽然在这期间和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文化先驱们也有人力图整合传统的、西方的和现代三种话语体系,探索中国文艺批评的现代化之路,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实绩,如鲁迅的“拿来主义”,朱光潜对超越性审美文艺精神的张扬,梁宗岱论文艺的“契合”理论,李健吾富有比较意识的文艺批评,但在剑走偏锋的文化激进主义潮流里,在救亡图存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语境中,这些边缘性话语并没有掀起多大风浪,自主性和民族化的批评话语系统并未现出雏形。

20世纪30年代之后,民族救亡成为高于一切的主流话语,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客观参照,中国主流的文艺批评也随之全盘苏化。20世纪40年代“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西方现代的文论资源与批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更是成了一个“雷区”,逐渐形成了一种批评话语的“大一统”局面。在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和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这种批评模式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并表现出存在的合理性,但它某种程度的封闭与偏执也使中国文艺批评丧失了多元化品格和开放性特征。反思历史,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改革开放的文化语

境使中国的文艺批评越来越重视西方的文化资源,西方文艺批评理论趁机打开中国的大门,再次掀起了波涛汹涌的西方文论热潮,其力度也为历史所罕见。中国的文艺批评也在“走向世界”的文化冲动中做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不失时机地清算了各种历史成见,抛弃了许多传统的批评套路,文艺批评的活力开始复苏。但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种复苏的力度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也许可以这么理解: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积弱承受不了这顿从西方呼啸而来的文化大餐的“恶补”。从接受基础上来看,西方文论有着坚实的逻辑哲学和语言学基础,而中国的传统批评偏重于形象思维,并不具备与西方对等交流的接受基础;从时间上来看,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就吃进了西方数百年的“余粮”,出现严重的腹胀是必然的后果;从效果上看,由于时间的仓促,大多数批评家只能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总而言之,缺少全面了解、深入研究和创造性整合,那种浅表化、扫描式的接受对于建构真正本土化的话语体系真的是勉为其难。

这种急于求成的后果,是让一个时代的批评家蜕变成了一个辛勤劳作的“搬运工”,将西方批评术语强行植入中国文学的批评,将外来的理论生硬地与中国文论体系相嫁接。这些前卫的批评家很多都是在忙于“跑马圈地”,不断地打出新旗帜,呼喊新口号,但大都是只刮风不下雨,缺乏辛勤耕耘,并没有收获多少开花结果的实绩。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批评家们似乎并不追求对‘理论’本身的理解,也不屑于去探究某种理论的真相,而是乐此不疲于‘理论’话语本身的新鲜感和快感。在他们那里,‘理论’完全被空洞化、形式化了,它成了前卫、新潮、具有‘理论修养’的象征。”^[6]与这种“怪象”同时伴生的,是对中国古典传统文论的漠视和无知,那些看起来很新锐的批评家都是言必称西方,不这样说话写文章就好像显示不出自己的学问与见识。这样,当代文艺批评的创新初衷就异化为“唯西是从”的盲从,文艺批评奉行的是西方文论话语的独白性原则,而缺少一种主体间性的对话精神。

这就很容易理解,在上世纪初和新时期中国两次西方文论的引进高潮中,后者的成就似乎远不及前者,在海量的具有博士、教授头衔的批评家队伍中,并没有涌现出如鲁迅、朱光潜、李健吾那样学贯中西、杂糅古今、富有创造性建树的大师级文艺批评家。尤为严重的是,主体意识和比较思

维的缺失最终导致了我们的文艺批评内忧外患、百病缠身,一方面,意蕴丰富、感性飞扬的传统文论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过度引进的西方文论水土不服。大家都在搬用生僻的术语,玩弄高深的修辞,表演炫目的技术,有趣味相投的则可掀起一股浪潮甚至形成门派,一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各种文艺思潮、文艺流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泛起了太多的学术泡沫,并没有建构起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水准、有着我们自己“发明专利”的批评理论体系,并没有传达出与世界上重要文艺批评派别相媲美的、有着我们民族独特审美体验的话语表达方式。对于西方的理论资源的接收上,我们功夫太浅,用力太猛,动作太大,造成了批评主体严重的“外伤”。

三

如何根治功利意识与人情面子诱发的当下文艺批评的“内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艺术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1]。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评论要建立和执行科学的评价标准,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文艺作品质量的准绳,辩证地看待市场因素的影响,具体的操作上要把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统一起来。”^[1]习近平总书记的“处方”绝对是对症治疗,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是指导当下文艺批评的思想力量、道德准绳和价值操守。

文艺批评要有责任担当,不可有太多的功利,不管是现存的理论还是在每一个评论家的内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难以判断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做,但奇怪的是这个简单的问题只能说,不能做,说起来可以振振有词,做起来就立即暧昧不清,一切原本坚定的立场会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一张嘴就是谎话连篇,尽说些取悦别人却说服不了自己的套话好话。由此可见,文艺批评中的责任担当意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认识上,更不是一个自我

标榜的口号,它只能体现在批评的操作层面,只能作为一种精神的操守落实在批评的实际行动中。

有人说,鲁迅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批评的时代。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充分体现了鲁迅作为一位批评家的公正态度,不管置身于何种危急的时势中,都秉承着“痛打落水狗”“一个都不饶恕”的战斗精神。在当下功利现实的批评乱象中,这种公正态度更应该成为每一位批评家的价值操守。

当然,力倡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并不是否定“寻美”的批评,在当下相对和谐的文化语境中,批评最直接的动机应该还是审美的欣赏,但是,一味“寻美”的批评也只能是残缺不全的批评,没有“求疵”和否定的批评,我们所寻之美最终要被各种人造的光环一块一块地遮蔽。有幸的事,还是有批评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批评其实更多的是面对残缺与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是的,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意味着尖锐的话语冲突,意味着激烈的思想交锋。这就决定了批评是一种必须承受敌意甚至伤害的沉重而艰难的事业。”^[7]的确,批判精神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本质所在,也是考量一个知识分子人格保守的重要尺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浮躁时代,文艺批评在“寻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敢于“求疵”,大胆说“不”,不为“利”所惑,不为“情”所困,对一些不良倾向和丑恶现象旗帜鲜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抵制不良的创作倾向,驳斥不好的文化现象,绝不把携带着病毒、生长着毒瘤的作品推向社会,而行使好文化“安全卫士”的社会职能。

可以作为结论的是,文艺批评的责任担当不能止于说,而是要始于做,是否做到了就看是否出示了批评者的批判精神,是否客观地对批评文本做出了审美与历史的判断,这与现实的功利和抹不开的情面是格格不入的。功利和人情如果过多过深地介入了文艺批评的操作,批评的公信力就很值得怀疑。

如何治疗理论资源“唯西是从”所造成的当下文艺批评的“外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开出的“处方”言简意赅:“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1]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批

评,理论资源的获得是一个关键问题,西方文论是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很值得我们吸收与借鉴,但中国文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也需要我们传承与创新。这个冲突的协调需要践行一种真正的比较思维。就连西方的学者巴赫金也这么认为:“文本的真正本质总是在两个意识、两个主体的交界线上展开。”^[8]中西文论的对话,不是一方要压倒另一方,也不是一个主体在独白式地表演,一个主体在虔诚地倾听,任何一种声音都是双声性的,只有奉行对话原则才能实现交流的目的,到达文本的真正本质。这种对话理论告诉我们,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交往,也应该是不同独立主体之间的对话、不同批评思想之间的交锋。对于强势话语的西方文论的接受,中国的学者也必须作为一个接受主体与之展开平等的对话,而不仅仅是倾听,不能满足于在中国文艺批评的处女地中“跑马圈地”式地搬移西方理论资源,也不能数典忘祖地在国人面前做着炫技性的表演。发扬自身的传统需要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身的失误和不足,我们文艺批评理论资源的获得,的确需要鲁迅先生主张的“拿来主义”,但“盗取天火”是用来“煮自己的肉”,所有的操作都是用来建构我们民族的、本土的、现代的文艺批评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批评范式的现代转换,是以丧失我国传统文艺理论资源为代价的,要建构文艺批评的中国话语,任何外来的理论资源都必须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经验。西方的话语体系与逻辑思辨的确能写出高深莫测的大文章,但中国的文论传统与直觉体悟也能成就精美的篇章,而且,对于崇尚意境、意象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来说,恰恰是这种直觉体悟的方式能够对审美对象进行最贴切的把握,如严羽评论唐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9]这里没有任何逻辑思辨的语言,只用了一连串禅宗式的比喻,就让读者品味到了唐诗独特的审美韵味,这绝对是任何一个西方文艺批评流派都做不到的,因为“言有尽而意无穷”,用西方的逻辑思维和范畴体系来评论意境丰富、富有意象特征的中国文艺必然不是十分有效。

由此看来,“唯西是从”的“外伤”需要“内治”,最有效的“处方”就是要挣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重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当前最为迫切的是

要回到中国文化传统,接通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同时吸收借鉴西方文论资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才能形成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做一个西方文化的传声筒,满足于用西方的口吻来讲中国的故事,用西方的话语来评判中国的文艺,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10月3日)中指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梳理、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推动美德、美学、美文相结合,展现当代中国审美风范。”

(本文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省社科院基地科研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5-10-15(01-02).
- [2] 洪治纲.信息时代,批评何为?[N].文艺报,2013-08-28(008).
- [3] 刘勰.文心雕龙[M].黄叔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76.
- [4] 张少康.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93.
- [5] 蔡元培.中国新文艺大系[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5.
- [6] 吴义勤.批评何为[J].文艺研究,2005(9):5-11.
- [7] 李建军.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J].文艺研究,2005(9):27-36.
- [8]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M].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05.
- [9] 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7.

(上接第 87 页)

关政策来引流金融机构,发挥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为安徽省 PPP 项目的建设提供融资通道。其次,通过省级金融机构加大 PPP 项目的资金投放政策导向,以及安徽各级政府的政策引导,鼓励各级金融机构对 PPP 项目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保障社会资本方的资金需求,由此优化政府和社会资本方的合作模式,由单一的 BOT 模式发展到多种合作模式,促进 PPP 项目的多元发展。

四、结束语

现阶段,安徽省各级政府大力推行 PPP 项目,PPP 项目也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虽然行业的集中度较高,但各个行业都有涉足;PPP 项目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如当地的 PPP 项目制度不完善、民营企业被“歧视”、投资回报机制不完善、金融机构支持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针对此类问题,在具体分析安徽省 PPP 项目的现状和政府政策现状上,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诸如各级政府完善政策、保障社会资本方利益、优化回报机制和完善金融机构保障机制等。以此鼓励社会资本方加大投资 PPP 项目和金融机构提高

融资额度,促进安徽省 PPP 项目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仪.PPP 模式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应用问题研究[J].市场研究,2016(8):4-5.
- [2] 于水,丁文,赵若言,等.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经济观察,2016(10):10-12.
- [3] 涂君山.湖北省民间投资发展的问题及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6(15):48-49.
- [4] 马君.PPP 模式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前景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1(3):43-45.
- [5] 财政部.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第 9 期季报[EB/OL].(2018-01-29)[2018-09-10].http://jrs.mof.gov.cn/ppp/deyjppp/201710/t20171027_2736578.html.
- [6] 总投资突破 3000 亿元!省财政发布 2017 年 PPP 项目进度[EB/OL].(2018-1-10)[2018-09-10].http://www.sohu.com/a/215845588_393135.
- [7]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情况通报(2017 年第 4 期)[EB/OL].(2018-02-24)[2018-9-10].<http://www.ahcz.gov.cn/portal/zdzt/PPP/gzdt/1519418527584613.htm>.
- [8] 周正祥,张秀芳,张平.新常态下 PPP 模式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软科学,2015(9):82-95.